

Taiwan
Digs

Jazz
週個爵士

2021 / 5 / 31

台灣 20:00 / 中歐 14:00 / 美東 8:00 / 美中 7:00 / 美西 5:00

音樂 x 文化 x 社群 跨國線上工作坊

【爵士音樂家訪談】Arturo O’Farrill

贊助  國 | 藝 | 會
NCAT

第五場【爵士音樂家訪談】Arturo O’Farrill

— Arturo O’Farrill —

爵士鋼琴暨作曲家，率領其拉丁非洲爵士管弦樂團 (*Afro Latin Jazz Orchestra*) 在世界巡迴，並榮獲多次葛萊美獎的殊榮。在四十多年的音樂生涯中，精彩的演奏經歷與多產的創作能量，以及從地方社區的音樂教育推廣到文化外交使節的身分，無一部展現其音樂生命的熱情。目前任教於加州洛杉磯大學的世界爵士研究、平等與多元共融部門等部門，亦為施坦威鋼琴藝術家之一。

由於其父，紐約知名的拉丁爵士音樂家Chico O’Farrill，Arturo O’Farrill從小環繞在音樂的環境，並在六歲開始學習鋼琴。但一直到十二歲那年，意外地在父親豐富的唱片收藏中，發現Herbie Hancock在Miles Davis唱片中Seven Steps to Heaven的演奏，使他立志作一名音樂家。就讀高中期間，與好友共組了樂團“非洲狂熱者 (Afroholics)”，並在一次位於紐約上州的演出中，得到鋼琴家Carla Bley的賞識，開啟了他的職業生涯。

(以下訪談，音樂家Arturo O’Farrill簡稱AO，主持人江忻薇簡稱H，與談

人祁苡瑄簡稱S)

AO：我高中時接了很多各式各樣的演出，當時上西城的音樂場景，圍繞在Bretton Hall。我的演出多到從學校退學。從進入Carla Bley的樂團後，開始當自由音樂家 (freelance)，同時又再度回到學校念書。到了台灣、古巴、俄國、非洲等世界各地巡演，從高中同等學力證明到榮譽博士學位.....，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了！

H：可以請你聊聊Afro Latin，以及Randy Weston所提到非洲的概念。

AO：林肯中心爵士音樂總監Wynton Marsalis，在2001年邀請我參與一個計畫，希望能重現我父親Chico O’Farrill的拉丁古巴爵士大樂團。當時，我的想法是拉丁音樂涵蓋的不只是古巴，還有祕魯、哥倫比亞、阿根廷等中南美洲各地豐富的音樂，於是我決定將這個樂團命名為非洲拉丁爵士大樂團 (Afro Latin Jazz Orchestra)。當時我有個很大的疑問，很多我們喜愛的音樂，像是搖滾樂、騷莎、嘻哈等，他們的根源都是非洲的節奏，其實來自非洲傳統宗教儀式的習慣。這些宗教上的儀式，有些來自於非洲的約魯巴文化 (Yoruba)，所以我稱我的音樂作非洲 (Afro)。你提到Randy Weston，他正是找我好好坐下來談談的人。Randy Weston對我說，你演奏的音樂來自非洲，你必須學習並了解非洲音樂是甚麼。所以當我成立非洲拉丁爵士大樂團時，我決定表明我的主張，很多人會說爵士樂是美國的古典音樂，並提到爵士樂是美國對文化的貢獻，我認為這是一種民族主義的作祟，是一個謊言。我認為爵士音樂是黑奴貿易這個災難下的文化遺產。爵士樂在古巴稱作曼波 (Mambo)，到了委內瑞拉稱作Joropo，是黑奴來到這個新世界 (美洲) 後，各種文化撞擊與融合出來的音樂。你在古巴，你會聽到他們演奏非洲古巴音樂，同時又演奏古典音樂與爵士音樂，但他們不會說自己是爵士音樂家。在我看來，拉丁與爵士是無法分開的。拉丁音樂就是爵士音樂、就是非洲音樂。

H：對於來自於不同文化背景的人，你會怎麼建議他們開始學習爵士或是拉丁音樂？

AO：我曾經在上海有過很美妙的經驗。當時我正跟非洲拉丁爵士大樂團到上海演出，我看到台下的觀眾，了解我們演奏的音樂並隨之起舞。我覺得文化是流動的，無論你是台灣人、日本人、俄羅斯人或是義大利人，你都可以擁抱另一個音樂、另一個語言、不同的料理與不同的舞步。我從不曾到過印度，但是我覺得印度的食物是全世界最棒的飲食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那就是**音樂是可以遷徙的，音樂是會旅行的**。以非洲古巴音樂為例

· 它的根源來自中東與印度，又有西班牙、北非與西非之間的連結。我們都是地球的一部分，我們都是一體的、一個大家庭。我一點也不訝異，如果我所演奏的音樂有一些台灣音樂的影響。我真心認為，我們都是這個星球的一份子。我無法變成台灣人，但是我學習台灣（的語言與文化）、台灣的音樂並擁抱它。我們也許不是住在同一個社區，但是我們可以愛各種音樂（或是文化）並擁抱它，並認為自己是這個遺產（heritage）的一部分。我想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來自於，大家習慣用國族、文化等來認定自己，但當你擁抱其他的文化時，你就是這個地球的一部分。你不只是台灣人，你不只是美國人或是古巴人類，而是**人類**。我所演奏的是非洲拉丁爵士音樂，但我不被這個標籤限制。這是音樂教會我的事：當你聆聽莫札特時，你聽到法國音樂、德國音樂、義大利音樂，他或許是第一個全球主義者（笑）。

S：我記得第一次跟你（Arturo O’Farrill）上課的時候，我感到非常挫折跟緊張。我想要表現得很完美，但是卻選到一首不會的標準曲。當時我告訴你，我來自台灣，這不是我的文化，我趕不上別人因為我不是在這裡（美國）出生長大的。而你回答我，我們看見的你不是台灣人，而是一個人，如果你不知道這首歌，那就先跟著哼唱，然後一步步地學習……在那一刻，我才理解那些壓力都是來自於我的念頭，而不是別人怎麼看我的。在我們的課堂之間，你也總是提醒我，作為一名音樂家，我們不需要將自己分門別類。

— 音樂計畫與紀錄片《Fandango at the Wall》—

退休的圖書館員**Jorge Francisco Castillo**，發起了一個音樂計畫：每年的夏天，在美墨邊境聖地牙哥與Tijuana的高牆兩邊，演奏Son Jarocho的jam session。Son Jarocho，這個來自於墨西哥Veracruz有著三百年歷史，結合墨西哥文化與非洲音樂等元素的民間音樂，亦被音樂學者稱作“非洲墨西哥音樂（Afro-Mexican Music）”。在紐約時報上看到這篇新聞的Arturo O’Farrill，決定打破各種不同的疆界（border），繼續並發展這個文化間、國家間、政治間的音樂計畫。

AO：Son Jarocho這個音樂，就是音樂遷徙一個很好的例子。在墨西哥Veracruz這個地方由於殖民與奴隸制度，打擊樂器是被禁止的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手作類似吉他的樂器jarana（西班牙吉他←中東烏德琴←印度西塔琴），並與踢踏舞來代替鼓的功能（非洲節奏），另外加上吟唱詩人的即興傳統（葡萄牙、西班牙）。當我聽到這個音樂時，我學到很寶貴的一刻。這麼多來自不同地區的音樂元素，Son Jarocho在這些音樂家的手上，卻保有如此濃厚的墨西哥風味，也再次證明：擁抱不同文化時，並不會

減輕 (dilute) 你自身的價值，而是讓你更成為自己 (more become yourself)。在拍攝這部電影時，分隔在由雞籠鐵絲築起的高牆之下，彼此在那小小的縫隙觸碰彼此的小指頭的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連結。

H：疫情之下，非洲拉丁爵士大樂團每周日固定在鳥園 (Birdland) 的駐演是怎麼轉變成Virtual Birdland一系列長達五十八周的直播影片？

AO：我二十五年前，加入了我父親的大樂團。我父親在2001年過世後，我承接了大樂團每周日固定鳥園的演出。當疫情襲擊，我了解到我的成員以及許多的音樂家，頓時失去了他們的賴以為生工作。於是，很快地，我開始籌募資金 (藝術家緊急基金)，希望能幫助這些音樂家，而開始了這個線上直播 (預錄) 的募款音樂會Virtual Birdland。.....每個人自願每周花費四到五個小時錄音錄影，在加上影片剪輯以及混音後製，相當於七十個小時以上的工作時數.....。身為一個人，在這麼緊急的狀況下，我們能做的就是站出來、繼續在自己的崗位上工作。有一件讓我很感動的，是能夠站出來發聲，因為很多人無法出聲。幫助別人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，在別人困難的時候陪他走過，是生命中的真諦。這不只是空口白話，而是我母親用身體力行教會我的：**生命的意義在於幫助他人**。音樂家的生活是不穩定、非常不容易的。我的父親在世時，幫助許多音樂家度過難關，而這也成了我的任務。

H：你是如何管理經營一個龐大的樂團以及各種音樂與社群計畫？

AO：首先，需要有個使命感驅動著你，如果我心存懷疑，這一切都不會發生。我對行政一點也不在行，但我很幸運身邊有一群理解我，並且願意一起為這個理想犧牲的人們。我知道在場有很多年輕藝術家，想要知道到底如何走下去，我認為當你心中很清楚想要完成的任務時，你會吸引幫助你的人。你創作藝術，是因為你必須。你是一把營火，其他人會慢慢地加入你，因為他們也要這份溫暖。而我的營火就是這個藝術，這個音樂，這個音樂有個目的，它的目的是去說出真相，說出這個社會的真相，說出很多人說不出口的真相，這是我的使命。我就建構了一個樂團來完成這個使命，而來自四面八方的人來協助我完成這幅想像的藍圖。這需要時間經營，並不是在一夕之間發生。我跟我的太太是從在廚房裡把一份一份的譜貼在一起開始。現在我想對在我面前的這些年輕藝術家說：心中保持你的使命，不只是演奏音樂，理解你的目的，知道你在做甚麼、為何而做。當你心中有使命時，大家會向你這把火靠攏，因為那份溫暖！

S：前面提到，我在（布魯克林大學）第一堂課時，向你（Arturo O’Farrill）介紹自己是新來的學生時，你對我說，我也是新老師。你一直都很謙虛！這也是我一直想像你看齊的一部分。

AO：我覺得自己並不是為了謙虛而謙虛，而是一股自信。我認為人性的展現是知道自己不懂但還是願意去做。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鋼琴家或是作曲家，我的工作去做、去說出真相。很多人認為我很自大，但我不認為這是自大或是謙虛，而是飢渴（hungry）。我的能力不足並阻止我想要改變這個世界的行動，我人生在世只有這麼多的時間，所以我把我的能量致力於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。這麼想也許並不謙虛，但這是我的目標，起而行之，就會成真。

H：可以請你跟我們談談你的教學理念嗎？

AO：音樂實際上是無窮的。如果我以為懂得夠多音樂，並以高人一等的姿態來指導學生，那麼我自己也失去了任何學習音樂的希望。如果我能帶領你，肩並肩一起探索音樂，那麼我就有更大的機會去認識音樂。我一直在閱讀一本書《Free Play: Improvisation in Life and Art》有二十年了。書中提到，學習即是回想（remembering），因為無窮的智慧早已刻印在我們體內。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怎麼演奏爵士，我們只是需要去想起怎麼演奏它。我們一直被學校的系統嚇唬：將你所學習到的知識嘔吐出來，我們就會給你一個分數、一張文憑。資訊並不是教育！我認為學習爵士就是學習即興，學習即興就是學習自由。沒有一本書可以教你如何自由，一個人唯一能夠告訴另一個人的就是「你有自由的權利」，而從那裏開始，就是我與我的學生們共同的旅程。

H：不管是疫情期間，你為音樂家失去工作而募款，或是對於種族歧視、移民等議題的表態。在音樂產業的政治氛圍之下，是甚麼讓你選擇對這些議題發聲？

AO：當在我生命幾個不同階段，總是有一些我認為，如果完成了會讓我感到快樂的事。像是十二歲的時候，我想彈得像Herbie Hancock一樣；二十歲的時候，我希望可以世界巡迴；二十四歲的時候，成家立業；二十九歲的時候，想要成名得獎。然而，每次當我完成這些事情時，卻依舊感到失落。直到2014年，因為都市的仕紳化，白人開始搬進原本以有色人種居多的貧窮社區，並希望趕走原本在社區演奏手鼓的音樂家，當時惡名昭彰的紐約市長朱利安尼，大肆逮捕在街頭演出的鼓手。因此，我開始思考對話的重要性、政治的重要性，並著手錄製一張專輯叫《鼓的罪行》（The

Offense of the Drum)》。這是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快樂，覺得感動、感受到自己。接著，下一張專輯，我探討美國與古巴之間的關係，美國身為一個世界強國為何打壓世界最窮困的國家之一的古巴？當我將我的信念與我的藝術創作結合，我開始感到快樂。很奇怪地，我的事業也開始有了起色。我知道這樣激怒了很多人，我也知道我再也不會收到某些機構的邀演。同時，跟你有同樣信念的人也會邀請你加入他們。我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聘任，今年也會參與新港爵士音樂節的演出。更重要的，我為我自己感到驕傲，因為我的藝術有了目的，不在只是為了演奏而演奏、不再只是為了作曲而作曲。每個人的藝術都有自己的目的，而我的目的是為種族歧視而發聲、站出來對抗仇恨與貪婪的醜陋。很多年輕的藝術家會認為，我連有個演出都很困難了，該怎麼去思考這些政治的事？我想說的是，你可以去做任何的演出，但記得你是為什麼而做、為了甚麼而錄音、為了甚麼而做藝術。當你都清楚了，你會到你要去的地方。

— 音樂專輯《四個提問 (*Four Questions*) 》 —

這張**Arturo O’Farrill**在2020年出版的全創作專輯，反應長期以來，美國所面臨的種族問題。專輯同名單曲《四個問題》，**Cornel West**博士的吟誦，引用**W.E.B. du Bois**在1903年提出的四個問題，帶出美國從黑奴貿易開始，四百年來的種族仇恨：正直如何面對強權打壓？真誠如何應對欺騙，風度如何應對侮辱，怎麼在被攻擊前自我防備？美德怎麼面對野蠻？勇氣如何面對暴力？.....在**Arturo O’Farrill**所帶領的非洲拉丁爵士大樂團層層節奏與韻律的堆疊之下，展現出這段歷史在面對打擊仍不斷茁壯的堅韌之美。

AO：有時候我做了一張專輯，覺得也許很有機會得獎，也有時候，我完全不覺得這是會得獎的類型。《四個提問》這張專輯在今年入圍葛萊美獎，完全出乎我的預料。當我們得獎時，我理解到這張不具商業價值、具政治性、社會性、爭議性的專輯，不符合我們一般所認為的「標準」，能有它在藝術上的位置時，我感到非常的驕傲。

劉俐（爵士歌唱家）：在非洲拉丁爵士大樂團的彩排，通常是怎麼進行？

AO：通常在我彩排的時候，都是非常有效率的。會先處理複雜的部份，然後從頭到尾走過一次，所以樂團的每個人知道樂曲的全貌。然後，才針對音樂性的部分像是大小聲、細部的輕重音等做一些調整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讓我的音樂家們知道，我在乎、關心他們，而不是在浪費他們的時間。身為一個領導人，我通常都不拐彎抹角，而是直接溝通。另外一個演奏拉丁音樂很重要的事，就是八分音符既不是搖擺的八分音符 (*swung 8th*

note)、也不是直直的八分音符 (straight 8th note)，而是介於兩這之間。簡而言之，彩排比須要有效益，先把困難的障礙移除，然後以音樂性與音樂上表達為中心。

S：在我擔任樂團助理期間，有一點讓我覺得非常敬佩的是，Arturo總是表達他對音樂家們的感謝，並讓整個彩排的過程，充滿正面的能量。

AO：我父親教會我一件事就是，你可以很會彈琴、很會寫曲，但記得是這些把氣吹進管子、撥奏琴弦、敲打著鼓的音樂家賦予了你的作品生命，他們才是你音樂中的英雄。

H：你在面試樂團成員的時候，看重的是甚麼特質？

AO：首先，我有個模型。我希望我的樂團裡有老有少、有男有女，因為我希望我的音樂呈現這個世界的樣貌，那麼我的樂團就需要先有類似這個世界的組成。以往在爵士世界，以男性、以白人為主的樣貌，已不合時宜。而在樂手的能力方面，他們除了有良好的演奏能力、視譜能力之外，我希望他們能夠有挑戰我的能力。我希望來面試的人，能讓我學到新的東西。

H：你可以給我們一個例子嗎？

AO：這時常發生。我跟我們的團員約定好，每年都會有新的面試，也許是新的空缺、又或者是代班樂手。常常資深的樂手害怕新手，但是新手也害怕資深的樂手，這讓我哭笑不得。有些樂手懂得比我更多，有些人視譜能力極強，有些人擅長歷史。與其倍受威脅，我更希望他們能進到我的樂團，挑戰我：為什麼你不知道怎麼寫這段薩克斯風部的五聲部的和聲進行？這邊你寫錯了！有更好的記譜方式等，帶著**探索音樂的精神**進到這個組織。如果有團員懂斯拉夫或是巴爾幹風格的銅管聲響，教導我怎麼去編寫那樣的裝飾奏，又或者怎麼演奏微分音，我當然會因為未知而感到恐懼，但同時想要學習更多。我希望我的成員比我更了解小號的指法，因為這樣音樂會變得更好。當然，如果帶著一種傲慢的態度，但身為團長的我可能會感到不舒服，但如果是一種愉悅、希望彼此進步的心，我更希望你可以教我，因為我想要學習。如果你在乎的只是自我而對厲害的音樂家感到害怕，那麼就太傻了。

吳玟葶（打擊音樂家）：常常在我們學習爵士音樂或是拉丁音樂的過程中，我們感受到了那些音樂上的精神、也聽到了特定的元素，但是卻缺乏具體連結的能力。可以請你描述你在學習爵士或是拉丁音樂的過程，如何面對這樣的問題嗎？

AO：有兩種學習的模式，一種是理性的學習，另一種是直覺性的學習。直覺性的學習是你假想自己是這個文化的一部分。我從未到過非洲，但是，天啊！我想到非洲！Randy Weston告訴我我演奏的音樂是非洲音樂，我甚麼知道我演奏的是非洲音樂？因為我演奏的確實就是非洲音樂！即使我不是一個非洲人，但我盡我一切所能去體現非洲音樂的美學。舉例來說，我不需要會懂迦納音樂中的複節奏系統或是中東音樂，我需要的是去理解、去學習，並且懂得那些音樂的美學，並且懂得如何在演我的演奏中，適當並尊重地去展現那些音樂的美學。回到你的問題，我認為每個人都權利自由地怎達自己。學習一個技能不代表沒有權利實踐或是練習這個技能，換句話說，如果演奏爵士讓你感到任何負面的想法，那是不對的。你有權利演奏你熱愛的音樂，你不需要是正確的。學習技術只是其中的步驟，你不需要是非洲人才能演奏非洲音樂、不需要是Bud Powell才能演奏Bud Powell。你知道嗎？這是我從Thelonious Monk身上學到的，當你在看他演奏的時候，你看到多少在鋼琴技巧上的挑戰，還有他精神上的問題，但是他誠實地表達自己，他不需要像Art Tatum一樣的炫技，因為你聽到的是一個人的靈魂。當我去看你（玟葶）演出時，我想要聽見你的靈魂，我不是來看你做不到什麼，也不是來看你對自己的懷疑。這是我希望別人來聽我演出的時候看見的，不是完美的一串十六分音符，而是我的掙扎、我怎麼跌倒、怎麼犯錯，然後又怎麼重新站起來。如果我去看一場演出，我想看到那些痛苦、害怕、勇敢，而不是完美。學習也是同樣一回事，你從犯錯中成長。

H：非常感謝Arturo O’Farrill今天撥冗接受我們的訪談，還有Sobina的協助，也感謝各位的參與以及互動。我們下周一同一時間再見！

延伸閱讀：

1. 《They came》收錄自專輯*The Offense of the Drum*

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GxWjyEkkahA>

2. 專輯*Fandango at the Wall*

https://youtube.com/playlist?list=OLAK5uy_l6G1YvnOceFBQyGYBU-9IvNrtaNPtjxE

3. 《Four Questions》

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NhnRpVnnIWs>

4. Virtual Birdland 第58周

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NyzQ3WCSwvU>